



【“我和我的祖国”征文】

改革大潮催生我的社工生涯

文 张雅玉 (长宁区雅玉党群事务所法人)

我是76届高中毕业生,1977年10月被分配到上海第十一织布厂当了一名挡车工。比起老三届、新三届的学哥学姐们,我们76届是幸运的,可以不用去农村插队落户了。纺织工三班倒,歇人不歇车。那时候的我年轻人不娇气,有一份工作就很满足了。我生性要强,凡事争先,不到半年就出了徒。从抽棉线、捻纤维,到接断头、拧成股,前后只需8秒钟。连续几年在技能比赛中被评为技术标兵,并成为车间教练员。可以这么说,我15年纺织女工生涯是在辛苦并快乐中度过的,以为自己端上了“铁饭碗”。

上世纪90年代初,上海进入改革开放后的第一轮产业结构调整,调整的“第一锤”砸向纺织业。从“压锭减产”到“砸锭关厂”,55万纺织工人走向“再就业”的艰辛历程。在“砸锭关厂”的名录中自然有第十一织布厂。作为55万分之一的我,似乎一夜之间“长大了”,感觉生活很沉重,很无奈。当年很多同事转岗到了公交公司和市容环卫单位工作,我的出路在哪里?我读过一些国外、港台关于“社工”职业的报道文章,但并不十分了解这一行。

平心而论,当时的人们对“社工”这一概念还很模糊,没把“居委干部”当作一份职业看待。我却不信那个“邪”,报纸上电台里不是在说,社会面临着转型吗?国家经济体制不正正在发生着变化吗?从计划经济逐步转向市场经济。过去的“单位人”不正变成“社区

人”了吗?社区工作的范围不就越来越大了,职能也就越来越多了吗?我坚信自己去当居委干部的前景是光明的。我的这一想法得到了家人的支持。

我于1992年7月转岗到了玉屏居委会。第一份社区工作是当调解主任,也就是公众“老娘舅”,专事邻里纠纷的调解。1997年10月,我调任天山三村居委会,先任居委会主任,后任党支部书记(再后来改任党总支书记)。昔日双目紧盯织布机,和布匹打交道;如今眼里望见的是张家阿婆李家伯伯,和人打交道。天山三村始建于1956年,我去任职那一年房龄已41岁了。由于历史欠账,老公房没有得到修缮维护,设施损坏严重。有能力的人家自然买房离开。这就形成这个居民区“五多”,即煤卫合用房型多、老年人多、大重病患者多、残疾人(含精神病)多和外来人口多。我深知,凭一己之力是很难改变三村面貌的。我必须靠“两头”,“一头”是赢得三村群众的信任,另一“头”是要争取上级街道的支持。我从掌握居民区各类人群的需求入手,理清工作头绪。我采取“早上班、晚下班”的办法,尽可能多的接触居民,俗话说“要识人头”,及时掌握居民“急难愁”的信息。并通过公开自己的家庭电话及手机号码,架起与居民之间一条全年无休的热线。通过成立三村“夕阳红”读书会,衍生出“听听国家事、议议小区事;说说心里话、聊聊邻里情;有难互助帮,快乐大家享”的居民自治平台。居民的精神面貌开始发生变化。

在我不断呼吁和申请下,街道十分“给

力”,帮助三村小区铺设小区通道,时逢迎世博老公房平改坡综合改造,小区内老公房得以整修。还迁出一家工厂,将其改造成公共活动室。三村环境面貌为之一新。

我作为社区工作者的职业生涯是23年。其间,党和政府给了我许多荣誉,先后被评为“上海市优秀共产党员”、“上海市志愿者优秀组织者”、“长宁区居民区党建金奖标兵”、“长宁区领军人才”等。并委以重任,推举我担任区和市的两级人大代表。2014年我到了退休年龄,却退而不休。受街道党工委的委托,2015年3月,成立了长宁区雅玉党群工作室,专事社区党群事务和居民自治的业务指导。经过四年的实践,摸索出“4+1”工作法,即党建惠民、自治惠民、法律惠民、健康惠民+社会实践点。让人们看到社会组织加盟基层治理和社区党建所产生的活力和作用。作为一名市、区人大代表,我“怀揣民情簿,为民鼓与呼”。履职期间提出的80件书面建议以及2个议案被市政府采纳,采纳率达89%。例如:关于修订《上海市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降低老年人优待年龄起点的议案(2014年),2015年推动修改了老年法,2016年65岁以上人员提前享受到75元现金补贴。

连同退休后创办社会组织的4年履历,我的后27年职业生涯是伴着国家的改革步伐,一路走来。是改革大潮催生了我的社工生涯,没有改革大潮,哪有我一个纺织女工变身社工的潺潺溪流?我的成长印证着时代的发展,国家的进步!

三张证书和一篇文章

文 张希纯 (长宁区商务委退休公务员)

此刻,我又拉开了那只抽屉,翻看着1978以来,岁月留痕的那些证书,那些旧物。蓦然间,那些过往的经历渐次向我走来,那些事件、那些场景,如蒙太奇的镜头回放,清晰依旧,感受却是不同以往。

看着这张1992年12月,长宁区政府“解困办”签发的“区解困工作先进个人”证书,那一幕又一次在脑海中跃出:“还有两户,还有两户……”我在睡梦中喃喃自语。是的,那段时间,上海第二次住房解困工作已进入尾声阶段,我所供职的系统紧跟这个节点努力着。那些天,我真的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想”啊。还有,随后的连着几天走访,核实……还有,送区解困办审核后落实,抵达解困的彼岸。

久远了,远去了,为何还记得?拿着这张1998年4月,区委办区政府办联合签发给被评为上年度调研工作优秀篇目《市属企业“放小工作”的几点思考》作者的荣誉证书,眼前也重现了几个片断:当时的我逐个企业走访踏勘,深入细致地调研,分别提出改革方案;比如不同人员的座谈会,比如反反复复的处理

信访工作……

哦!这是一张2001年4月,区“十五计划起草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副组长签名的证书,读着:“你荣幸地参加了区十五规划纲要起草工作,以作纪念”的文字,顿时感慨万千,那些数字、那些目标、那些措施……反反复复,斟字酌句,秀才们有时还会争得面红耳赤,不为别的,只为一方土地的发展兴盛。

翻阅着,回忆着。一本《上海中小企业——2008年1月刊》进入眼帘,里面刊有拙作《“创意园”应该是什么?——由热议“创意园”引发的些微思索》。这是始于1990年末的工业闲置厂房改建为都市工业园推进到新阶段的创新探索,我作为政府职能部门职能科室的责任人,经历其间数年具体工作后才有了这篇实践经验之谈的小文,而且又是我识字以来第一篇被发表的文章,留下了烙印般的记忆。

行笔间,脑海中忽地跳出那句经典口号:“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是啊!以“新时代”的思维,看着今天的上海城市建设和日新月异的城市面貌,想想党领导人民过去这几十年来之努力和奋斗,凡身在其中的参与者

和见证者,谁不感慨万千?让我感慨万千的不仅仅是上海发生着巨变,我还有幸参与了这一发展进程中的几个重要节点工作。1990年代初的人均居住面积2.5平方米和4平方米(都是含及以下)的两次住房解困工作,着力点是“民生”,大方向是住房制度的改革和城区面貌的更新。市属轻工、纺织小企业划归属地管理,称之为“抓大放小”,着力点是“产业结构调整”,大方向是以经济体制机制改革促进产业发展。而“十五”规划纲要更是以改革开放为主轴,其大方向不言而喻。至于“创意园”建设则是深化产业结构调整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我从从事二十余年的以微观经济管理为主的最后一站岗位履职工作。尤其是“句号”画在了2012年3月跨入花甲之时,脑海之印记则更为深刻。

那些年,我既是亲历者,跟着祖国前进的步伐、上海发展的节拍,努力从事着这些意义重大的经济工作;我同时又是受益者,“所大学”所获得的知识以及在工作实践中探索,曲折中得到的种种磨炼,很是丰厚。退休已进入第八个年头了,坐在摇椅上闭目回顾,心头仍感一股暖流在涌动。

今昔雨雪两重天

文 曹荣新 (长宁退休居民)

2019年年初,上海接连下了一个多月的雨,创下有气象记载的最长阴雨天记录。不见太阳的日子,少不了网友们的调侃“太阳公公躲起来了”“女祸再来补天吧”。现实生活并不因为低温多雨而遭受破坏,蔬菜供应正常,物价平稳;城市交通秩序井然,各行各业依旧如常。然而,这般的恶劣天气,若是搁在改革开放前,那就不好说了。

我从小在中山公园附近的弄堂旧里长大。长宁电影院旁边的9层楼住宅西园公寓,是当时长宁区最高的建筑了。我居住的弄堂房子一到阴雨天,家家户户愁眉不展。大人和孩子上班上学没有人人一把伞是一难;雨天里马路菜场去买菜是一难;倒马桶和到公共供水站挑水又是一难;落雨天生煤炉更是一难;遇上大暴雨弄堂人家家里浸水是难上加难……往事历历在目,不堪回首。

2018年农历“大雪”季节的第二天,上海迎来一场难得的大雪。男女老少为银装素裹的城市欢欣鼓舞,纷纷走出家门,举起手机相机拍摄这难得的雪景,在朋友圈里不断群发。赞美老天爷赐予地处江南的上海也有如此美妙的雪中美景。笔者在和孙子嬉戏玩耍雪仗后,不禁陷入沉思:这要是搁在半个世纪前,人们不仅不会欣喜,还会诅咒大自然的严酷。清楚地记得,五六十年代,每到寒冬腊月,我们的父辈就愁着给孩子们添棉衣棉被,冰冻下雪更是为每天全家老少的饮食和出行愁眉不展。铝锅煮好的饭要放入饭窟(用稻草编织的草窝)并裹上破棉絮保温,被窝里塞进汤婆子、热水袋,废弃的盐水瓶灌上热水也能取暖。如再遇到自来水水管结冰冻住,煤炉熄火,电表短路,菜米油盐断货等,那种生活的窘迫真是“冰冰凉凉透心凉”了。当年一句“落雪啦!”,让人们胆颤心寒。

在插队落户的岁月里,一遇到“下雪

啦!”,要么提前回城,要么就整日卷缩在被窝里,既盼天亮出太阳,又等天黑快上床。冰冻雨雪天,我们这些没有结婚成家的知青就度日如年了。不知何处有温暖?没有干柴草烧锅,只能用煤油炉煮饭,没有小菜下饭,酱油拌饭果腹;没有精美白面,煮红薯充饥。茅草屋里寒气逼人,将化肥塑料袋或编织袋用图钉封堵窗户门扇来抗寒,那般的寒冷寒到骨子里,冷到心里……

俱往矣!改革开放让中国老百姓告别了贫穷困苦。上海40多天的阴雨天,虽然没有太阳的光和热,却有处处空调的温暖。晒不成衣被,家有烘干机替代光照。人们在空调房里呆久了,反而愿意去雨地雨天里换换空气。上班的、上学的,一如往常;退休养老的,看书读报玩微信,自得其乐;水、电、煤、卫、衣、食、住、行一切如常,电饭煲、洗衣机、烘干机、微波炉、电水壶、保温杯、空调、油汀、

【岁月悠悠】

阿拉弄堂拍电影

文 陈日旭

没有比看自家弄堂里拍过的电影更来劲的事了。上世纪40年代初,我出生在曹家渡西电影院隔壁的“老公益里”。那是真正的“贴隔壁”,我家住于弄口2号,老房的墙紧挨着影院的墙。旧时,影院夏日无空调,晚间放映时都开启高处窗户透气,于是从我家二楼南窗斜面看出去,可以瞥见影院内射向银幕的一束闪亮白光。再晚些的第4场电影,甚至可隐隐听见影片人物对话声。若是战斗片,那轰隆作响的枪炮声更是不绝于耳……

1957年某日,已在初中读书的我放学回家,只见电影院一侧人山人海,警察亭后被围起老大一个圈,圈内有大卡车停着,地下有成堆的粗电缆,弄堂口成了中心。听大人议论,这里正准备拍电影,片名是《永不消逝的电波》。我被纠察挡在圈外,幸好有一位戴红臂章的老妈妈认识我,出面道:“这个小弟弟住在弄堂里的,让他进去吧。”

一路进去,只见电影制片厂的工作人员忙上忙下,气氛紧张。弄口的洗衣作被改名为“上海王新记染染店”,一旁还有繁体字的“精工织补”广告字样。弄口一顶大伞下,油豆腐线粉摊氤氲着热气。我家楼下的小毛丫头梳“乌龟团”发髻,坐于小凳上伴作在木盆里搓衣;唯有左侧的老虎灶模样依旧。因为拍戏的情节从弄口开始,所以从楼窗缝里观看的角度得天独厚。

排线仅限于几个动作:好几个特务跳下车子,持着手枪,鬼鬼祟祟作抓人状;还有人扛着长竹梯冲进弄内,连续好几遍,看得都乏味了。让我眼睛一亮的是,著名演员王心刚油头粉面,蓄着胡子,穿着皮茄克,扮演反面人物特务头子。另有一位面庞较福相的中年女性,长波浪式头发脑后用手帕扎起,脖颈上挂着秒表和叫扁(哨子),发号施令指挥着众演员,显得十分干练,后来我才得知她是该片导演王苹。直到华灯初上时分,四周的水银灯齐亮,弄口的弹咯路用水浇得湿漉漉,在导演的口令下,摄影机开动完成正式分镜头拍摄。至于由孙道临扮演的男主角李侠走进弄堂深处的镜头,因禁止走动,我无法看到。人们纷纷传言,当年地下党员李白确曾潜藏在我家居住的弄堂秘密活动过……

1958年,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在沪西电影院上映了,轰动了曹家渡附近的居民,男女老幼,奔走相告,争着一睹为快。一时间,楼下的毛娘、线粉摊主“小六子”,似乎成了电影大明星。我清晰地记得,当我看了第一遍后,又与同学一起到沪西电影院看第二遍,还特别提醒大家认真看片尾的镜头。散场后,同学们还聚到弄口,议论着影片的拍摄角度、取景范围。

影片的情节在上海展开,片中处处充溢着上海元素。如黄浦江、外滩、外白渡桥;石库门弄堂、小马路成排的电线杆、昏黄的路灯;老房内的木楼梯、小阁楼;道具有蒲扇、瓷茶壶、铁皮闹钟、奶油蛋糕、火柴等。甚至人物对话也用沪语插话,如“吃排头”、“搓麻将”、“李太太,有空请过来白相”等,让沪上观众倍感亲切。

转瞬之间,《永不消逝的电波》发行已一个多甲子,当时为之深深感动的我,已成了蹉跎老叟。60个春秋过去,片末那“嘀、嘀、嘀……”的电报声伴随着主人公:“同志们,永别了。我想念你们”的坚定独白心声,犹在耳畔;那蓝天白云、炮火硝烟、五星红旗画面重叠的镜头,永驻心间。这确是一部新中国电影史上堪称经典的好电影,更让我心仪的是在我故居弄堂拍过外景。

地暖,一应俱全。不想雨雪天出门买菜,可以让快递小哥送菜上门。如今的好日子啊!是我辈童年时代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今昔雨雪两重天。40多天太阳虽未露脸,老汉我心里却始终亮堂着,始终暖暖的,我感恩新中国,礼赞新时代。我打心底里喊一声:珍惜啊,这国泰民安的好光景!